

## 中国还不是第一大经济体

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经济学教授）

很多人声称中国将要迅速超过美国。本文则认为这一说法源于统计数据的误用。由于价值1美元的人民币在中国的购买力超过1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利用国际比较项目（ICP）价格数据来对比生活水平很有必要。但事实上，中国农村廉价的大米和衣服并没有促使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规模取决于1元人民币在世界市场上的购买力。使用正确的价格后，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经济实力远超其他国家。

### 美国仍是全球最大经济体

近来各种报告大肆鼓吹：“中国今年将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这种说法完全是错误的。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经济实力远超其他国家。

得出中国即将超过美国的判断是基于4月29日世界银行发布的ICP中的一份报告。ICP的工作非常具有价值。ICP的数据是通过购买力平价而不是实际汇率来比较不同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如果你对个人生活水平很感兴趣，那么这么做就正确了。在我看来，如果你对测量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很感兴趣，那么这样做就不正确了。当考虑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规模时，就应当关心人民币在世界市场上的购买力。购买力平价告诉你，在中国，人民币能买到多少理发服务和其他当地产品。

中国的根本情况是，在某一标准（依购买力平价修正后的人均收入或是以实际汇率计算的经济总量）上赶超美国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这丝毫不会影响中国惊人的增长纪录，近30年来10%左右的年增长率创造了历史奇迹。

按照目前的汇率，美国经济几乎是中国的两倍——准确来说比中国高出83%。但是中国超过美国的那一天指日可待。如果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年增长率高于美国5个百分点，以及人民币每年实际升值3%（通胀较高），那么中国将会在2021年超过美国——很快，但绝非眼下。

### 购买力平价调整的正当使用和不当使用

用购买力平价还是汇率的问题对国际经济学家来说再熟悉不过了。这一恼人而又不可避免的技术问题是因为中国的产出是用人民币衡量，而美国的收入则是

---

本栏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监测（CEEM）全球智库半月谈”编译组编，所选内容来自世界主要经济智库公开发表的最新评论、研究报告及工作论文，其观点不反映编译组成员及其所在机构的看法。

用美元来衡量。如何转换这些数字才能使其可比呢？常见的解决方案是使用同期汇率（用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乘以中国的GDP，将其用美元表示）。

不过有人指出，如果想要测量中国公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须考虑这里的商品和服务更加便宜。1元人民币在中国比在国外能够花更长时间。有一些国际贸易品的价格也相差无几。中国与美国的T恤价格几乎一样，部分原因是我们从中国购买。（原油在中国和国外的价格都很便宜，因为中国可以进口原油。）但像理发——这种服务不能轻易地在国际上交易——在中国就比美国便宜得多。因此，如果想比较各国的人均收入，就必须测算当地的购买力，ICP就是这么做的。

#### 购买力平价的正确使用

购买力平价有很多用途。第一，了解哪一届政府成功地提高了公民的生活水平。第二，在控制生产率的条件下，判断一国货币是否“被低估”。第三，判断是否有理由相信国家能够减少污染。据国际数据估计，二氧化硫的转折点大约是人均GDP达到10000现价美元。如今中国正处于这一转折点。

即使按购买力平价测算，尽管中国的人均收入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增长了很多，但中国仍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当前中国的人均收入和阿尔巴尼亚相同，处于199个国家的中间水平（第99位）。

但是阿尔巴尼亚很少成为头条新闻。为什么我们对中国如此感兴趣？部分是因为它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但并不仅仅如此。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当你用中等人均收入乘以10亿人口时，你将得到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巨大的人口和中等收入的结合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

为什么我们认为美国是现任第一大国呢？部分是因为它很富有，但并不仅仅如此。如果按照人均收入标准，那么摩纳哥、卡塔尔、卢森堡、文莱、列支敦士登、科威特、挪威和新加坡都排在美国前面。

从比较的目的来看，是使用实际汇率还是使用购买力平价都无关紧要。人均收入的相对排名以及经济规模的排名并不依赖这一技术选择。原因是购买力平价和人均收入高度相关，这一现象被称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你如果正在选择成为哪个国家的公民，可能会考虑这些富有的国家。但是我们并不认为摩纳哥、文莱和列支敦士登是世界的主要经济大国，因为它们是如此之小。美国成为头号经济强国是由大量人口和高人均收入共同造就的。

#### 购买力平价的错误使用

所以人们对中国经济规模或经济实力的问题，尤其是挑战者如今是否已经替代了卫冕冠军成为头号强国充满了兴趣。在我看来，购买力平价并不是做这种比较的最佳选择。为什么呢？

当讨论经济规模或者经济实力时，我们事实上是在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从跨国公司的角度看，中国市场有多大？从全球金融市场的角度看，人民币能否挑战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多边机构的角度看，中国能够贡献多少资金并得到多少投票权？从中国南海那些持有异议的国家的角度看，中国军队能买多少船只？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及其他大多数有关经济实力的问题，你需要使用经过当前汇率换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其实，当期汇率法比购买力平价法更适合用于国际比较。汇率经常大幅波动，导致比较效果有时并不理想，但如果使用五年平均汇率来替代年度汇率，效果就会好得多。此外，汇率波动即使看似很大，相比于其他统计问题，对中美比较的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相反，购买力平价的误差只会使结果更加糟糕。

（原文为英文：“China Is Not yet Number One”。见 <http://www.voxeu.org/article/china-not-yet-number-one>。2014年5月。编译：朱振鑫。）

## 全球大型贸易协定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约翰·沃雷 [John Whalley,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加拿大全球治理创新中心 (CIGI) 首席研究员]

随着美国总统奥巴马以贸易为焦点的亚洲之行的推进，我们有必要反思美国的大型协定新策略及其对全球贸易系统的影响。“大型协定”一词代表欧美之间和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大规模的、有望实现的协定，如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 (TTIP) 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然而，大型协定远比上述两类协定要广泛得多——不仅包括上述列举的，还包括中国和亚洲的其他国家将要达成的，而非仅限于 TPP 伙伴国。

1987年，加美自由贸易协定启动双边谈判，促成了1993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的签订。在此期间，全球经济见证了区域贸易协定数量与形式的激增——截至2014年1月，WTO共收到来自583项区域贸易协定（分别包括商品、服务和加入协定）的报告，其中377项已经生效。然而，这些协定中的大部分或限于小国间，或限于大国与小国之间，且带有明显的预期，比如中国—东盟协定和NAFTA。考虑到大国将WTO作为同其他大国展开实质性协商的平台，以成对或集团的形式在大国间出现的协议相对较少。但过去两年内，OECD国家期望以出口振兴经济，且WTO谈判进展受阻，一系列大国间贸易协商的可能性涌现了出来，这涵盖了大部分G20成员。

大型协定具有在全球范围内流行的潜质。目前，潜在的大型协定对各国设立

了不同的准入指标：GDP 高于 1 万亿的经济体、以 GDP 规模计排名前十的经济体、以贸易规模计排名前十的经济体、G20 等。尽管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之间的全部协定（已发生或正在计划中的）都可算作大型协定，实际上的“大型”协定直接涉及欧盟、美国、中国和东盟，以及中等规模国家（如日本、加拿大、巴西和土耳其）。大型协定也可能在国家集群的参与中而产生，如涉及中国的东盟+6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定。

一个关于大型协定的预设是，它将像现有的小国间协议那样，涵盖商品、服务和投资，为一系列事务设定独立的章程，比如知识产权、农业、竞争规则等。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关于服务领域的单独协定，而投资条款则可能完善现存的双边投资条约，后者比区域贸易协定还要多。单个来看，预计这些条款将被整合到一个框架中。大型协定中的贸易条款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部分，这意味着服务业贸易在更大范围的开放，以及投资条款对伙伴间竞争制度的改善。

部分规模更大的大型协定（如 TPP 和 RCEP）已进展到工作小组阶段，以讨论更为具体的内容。在此背景下，奥巴马的亚洲之旅被视为增加美国在大型协定中参与度的信号。部分情况下，这一阶段将涉及规制及其他话题，超出了 WTO 协议的范围，有些讨论还将涉及个人跨境流动等话题。如果美国提出的某些话题，如法规调和及国有企业被纳入大型协定的谈判中，大型协定将走得更远。弗格森（Ian F. Fergusson）等人研究了美国目前逐项谈判的事务，包括市场投资、竞争政策、贸易救济、劳工与环境，并研究了新的跨领域事务，如对商品和服务的管制渠道，还研究了农业及谈判的核心事务，包括知识产权、原产地规则、贸易的技术壁垒、国有企业、电子商务、竞争力和供应链，以及中小型企业。在未来的谈判中，中国的长期兴趣将是提出贸易救济话题，更具体地说，是反倾销话题，后者无疑需要新的惩戒机制，并可能提高对外资流动的限制。

双边或区域性贸易协定内在地具有排他性。那些未参与大型协定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因区域伙伴间的贸易创造而遭受冲击。WTO 在未来多边贸易的影响将被一系列双边或多边大型协定所取代，许多国家将在他国的驱动下参与此类协定的谈判。鉴于贸易与出口增长对中国保持 7.5% 的 GDP 增速的重要性，出于在全球体系内竞争的需求，中国可能比其他国家或实体更热衷于参与大型贸易协定。

因此，决定全球在大型协定的道路上能走多远、走多快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欧盟—美国 TTIP 的达成速度和涵盖内容，以及 TPP 谈判成功的前景。后者或将吸引中国参与 TPP 谈判，迫使中国就国有企业等方面的非关税问题展开一定程度的协商。随着其他大型协定的提出，全球经济的动态是关键。总体上，该动态暗示着各国在基于贸易的大型协定中几乎不可避免的、更加深入的参与度。

大型协定在两个不同层面上是有效的：一个层面包括全球四大经济体（美

国、欧盟、中国和东盟)间的双向贸易,另一层面包括上述经济体中的每一个与许多重要的中等规模伙伴(日本、韩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间的双向贸易,前者似乎更可能为全球贸易体系的发展搭台。美国可以通过其对各项大型协定的姿态影响未来贸易体系的发展,反过来,大型协定则可能确定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态。

(原文为英文:“Global Mega Trade Deals and the Impact on China”。见 [http://www.cigionline.org/publications/global-mega-trade-deals-and-impact-china?utm\\_source=homepage-feature&utm\\_medium=web&utm\\_campaign=UX](http://www.cigionline.org/publications/global-mega-trade-deals-and-impact-china?utm_source=homepage-feature&utm_medium=web&utm_campaign=UX)。2014年5月。编译:黄杨荔。)

## 中国的货币政策与利率自由化

廖薇 (Wei Liao,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研究部经济学家)

桑帕闻德·儒勒·阿门德·塔普索巴 (Sampawende J.-A. Tapsoba,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研究部经济学家)

货币总需求目标的设定依赖于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金融创新和自由化可以改变货币需求、产出和利率的关系,从而影响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同时降低货币总需求目标的有效性。例如:大量利率衍生产品的出现会提高货币的利率弹性;大量信贷产品和杠杆工具的使用会降低收入的货币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只使用直接工具并不能有效地影响实际产出。央行需要间接的货币政策工具比如利率来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

### 国际经验

我们研究了大量经历过重大金融市场改革的国家,并集中研究金融市场自由化对货币政策环境的影响以及中央银行如何对这一环境变化做出反应。下面以日本和韩国为例详细说明。

日本:在1980年之前,日本金融体制是高度管制的,利率低于市场出清利率水平。经历过1980年代一系列宏观环境变化(石油价格冲击,公司借贷意愿下降和国内财政恶化)后,日本开始推行金融市场自由化政策: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存款利率自由化、提高金融工具的有效性、去除银行机构和证券公司之间的壁垒。随着利率的自由化,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乘数也开始发生变化。这一系列结构性变革导致货币政策也随之变化。利率被引入货币政策的目标和中介指示指标,日本银行逐渐放开对货币数量的直接控制,转向更多的间接工具——国库券、大额定期存单、商业票据等。

韩国:韩国的金融改革发生在1980年代后期,比日本略晚。改革主要包括

银行间市场和商业票据的利率自由化；国有商业银行的私有化；放松对银行信贷的直接控制等。金融市场的结构性改革改变了韩国货币政策的环境。存款准备金的下降以及利率的上升导致货币乘数增加；货币流通速度由于非银行金融活动增加、理财产品增加等而呈下降趋势。因此，韩国的货币政策也开始转向间接调控，并尽力恢复传统央行货币政策工具，如再贴现率，准备金制度以及公开市场操作。而且，随着汇率弹性的增加以及利率的市场化，货币—产出—物价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强化。

### 实证分析

首先，我们以丹麦、法国、日本、韩国、墨西哥、挪威、瑞典和美国为样本，使用时间序列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上述8国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对货币需求函数的影响以及导致货币需求函数不稳定的因素。结果如下：第一，在整个样本区间内，货币需求函数是不稳定的；第二，在金融自由化前后的子序列内，货币需求函数是稳定的；第三，国内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指标（ $M_3/M_2$ ）以及房价会显著影响收入和利率的弹性，也即影响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

然后，用同样的方法研究中国的货币需求函数。发现：在2002年第一季度到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的 $M_2$ —收入—利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2009年第一季度到2012年第三季度也存在协整关系，但整个样本区间内不存在协整关系。这说明中国的货币需求函数在2009年第一季度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这也许与2008年后中国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加快、房地产价格飙升有关。

### 结 论

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函数的收入和利率弹性都有显著的影响。对于中国更是如此。2009年第一季度的结构性断点很可能与金融创新引致的银行表外业务扩张以及非银行金融活动增加有关。上述结果表明： $M_2$ 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性指标，其有效性正在不断降低。随着金融改革和金融深化的持续，央行货币政策迫切需要转向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利率）。

而且，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会加强间接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以及利率作为价格工具的适用性。此外，使用由市场来决定的货币政策工具，会大大促进经济的稳定。但这一转变，对于中国并不容易。因此，我们在转变货币政策工具的同时要发扬“干中学”的精神。

（原文为英文：“China’s Monetary Policy and Interest Rate Liberalization: Lessons from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见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14/wp1475.pdf>。2014年4月。编译：郭子睿。）

## 中美如何审视对方——兼论两国何以驶进相互冲突的路上

裴敏欣（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

中美关系很明显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基本上没有太多异议，但是并不那么明显的则是这一关系的本质。不久之前，观察者还普遍将这对关系定性为非敌非友，这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随着世情国情的变化，这一关系也在发生着细微的变化。尤其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及中国的迅速崛起，这势必影响双方各自看待对方的态度及处事的行为。结果最近中美关系的紧张就不足为奇。要对变动中的中美关系保有一种合理的把握已属不易，而更具挑战性的则是对两国的具体分歧有一个深入准确的理解。政治学者尼娜·哈奇格恩（Nina Hachigian）编撰的《论辩中国：十组对话中的中美关系》则是朝该方向的一个极好的努力。该书针对中美关系中的十个问题找了中美双方的顶级学者进行对话，并就其中的分歧之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总的来说，该书有很多精彩之处，但读罢也让人略感沉重，因为即使对中美关系前景带有乐观倾向的人在书中也极少发现可以高兴的理由。

### 对与错

在一些议题上，双方有着共同的基础。比如辩论双方都认为中美关系已经被双方的不信任所损害，尤其是中国日渐增长的民族主义。中国的一些学者也认为只要中国国内政治没有大的变化，中美间的结构性矛盾将长期存在。但是在其他一些议题上，比如中国的军力现代化、人权、台湾问题以及地区安全等，双方的分歧则较大。双方不仅有着不同的哲学，而且有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事实都是不一样的。其中一些争论的议题较容易达成妥协，而其他的则更难。从这本书的角度看来，在经济政策、气候变化、与安全无关的全球责任等方面双方受战略互疑的影响较少，并且有更多的合作意愿。但是更深的并且将更多决定未来中美关系本质的分歧则在可预见的将来得到解决的可能性非常小。在这些方面，两国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只能是去进行管控。事实上，该书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揭示了中美关系驶向日渐竞争方向的程度。照此下去，中美关系之前“非敌非友”的定位将逐渐被“未失控的竞争对手”关系所取代。

### 假设上的分歧

上述令人忧虑的趋势其实在双方论辩的假设、论据及原则上都有所体现。比如中国学者一个基本的论断就是华盛顿应该因应中国的日渐强大而改变其亚洲政策，而美国学者则认为中国的崛起并非必然。另外一个议题是双方都认为对方的行为和政策缺乏正当性。此外，该书的一个发现是美方一直声称其亚太再平衡战

略并非旨在遏制中国的努力并未得到中方的理解和接受，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忧虑。鉴于美方已经向中国开放市场、帮助其培养不计其数的优秀人才、在中国大量投资以及协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美方很难理解北京为何指控华盛顿试图阻止中国的崛起。

### 现实主义者的困境

三十多年来，美国对华政策都是建基于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两方面的假设之上的，但是按该书的发现，中美关系的走向似乎正在更多滑向现实主义的逻辑。自由主义的逻辑在中国比较羸弱的时候有更多的解释力，但是自由主义者的视角忽视了中国当前的崛起并不意味着对国际自由秩序的一种支持和认可。鉴于国际体系与中国政体主要特征的不可兼容性，比如国际体系的开放与规制和中国国内政治的封闭及人治，很多观察者相信有理由怀疑中国会承认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合法性。相反，中国极有可能试图改变该秩序或者构建一个平行的秩序。中国对上合组织的关注与投入就是一例。中国最近提出的引起极大争议的航空识别区也增加了其与美国及盟友的冲突风险。美国应对的最佳战略还是继续两面下注，这一战略旨在支撑接触政策的背后加强与地区盟友的关系以确保其不会轻易受到中国的胁迫。

（原文为英文：“How China and America See Each Other and Why They Are on a Collision Course”。见<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40755/minxin-pei/how-china-and-america-see-each-other>。2014年4月。编译：彭成义。）

## 2014和2015年全球贸易将适度回升

### 世界贸易组织（WTO）

WTO的经济学家认为，全球贸易将在2014和2015年呈现适度增长态势，预计增长幅度分别为4.7%和5.3%。虽然增幅未超过过去20年5.3%的平均水平，但高于过去两年平均2.2%的增长幅度。

2013年贸易增长步伐缓慢的原因来自发达经济体进口需求不足（-0.2%）和发展中经济体进口增长平缓（4.4%）。在出口方面，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都很缓慢，分别增长1.5%和3.3%。

WTO总干事阿泽维多（Robert Azevedo）称：“过去两年全球贸易增长十分疲弱。展望未来，如果全球GDP增长预测成真的话，我们将在2014年迎来普遍但适度的贸易回升，而且这一趋势在2015年将得到进一步巩固。显然，随着世界经济的好转，贸易也将会好转。但我知道，只是坐等贸易自动增长对WTO成员来说



是不够的。”

他补充道：“我们可以通过更新贸易规则、达成新的贸易协定来积极支持全球贸易增长，2013年12月巴厘岛协议说明了这一点。完成多哈回合谈判将为未来贸易提供坚实基础，并为当前贸易的缓慢增长提供强有力刺激。我们正在讨论一些新思路和新方法，它们将有助于我们完成这项工作，而且是迅速完成。”

造成2013年全球贸易和GDP增长疲弱的因素包括：欧盟衰退带来的持久影响，欧元区失业率高企（德国是一个明显的例外）；美联储量宽收缩时间的不确定。后者在2013年下半年引发了发展中国家金融动荡，尤其是那些经常项目大幅失衡的新兴经济体。

WTO对2013年全球贸易增长的初步预测是2.1%，这是全球货物出口和进口价值量上的增速，也就是对各国通胀和汇率进行调整后全球贸易的实际增长速度。这一增速略低于WTO在2013年9月预测的2.5%。修正的主要原因在于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在2013年下半年出现了超预期的大幅下滑。在过去的两年，全球贸易增速大致相当于市场汇率计的全球GDP增速，而不是通常的2倍。

最近的企业调查和工业生产数据显示，美国和欧洲在2014年开局时的复苏正在得到巩固。美国就业数据的逐渐改善允许美联储开始进行计划中的第三轮量宽收缩；尽管欧洲外围经济体的表现不如核心经济体，欧盟增长仍呈现不平衡局面，但其增长前景也已经有所改善。随着计划中财政整顿的实施，日本2014年的经济增速将仅是略微下降。尽管发展中经济体（包括中国）最近经济增长疲弱，但它们在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增长方面将继续超过发达经济体。其中一些国家有可能遇到挫折，特别是容易受到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重新调整影响的国家。

2013年，全球货物贸易金额为18.8万亿美元，增长2.1%，略低于全球出口的数量增速（2.4%），这意味着同期出口价格略有下降。此外，2013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金额为4.6万亿美元，增长5.5%。

2014和2015年全球贸易增长的预测基于以市场汇率计算的全球GDP将分别增长3%和3.1%的假设。请注意，关于GDP的预测是大家的共识而不是WTO的预测。贸易预测的风险主要集中在下行区间，但仍然有上升潜力，特别是考虑到发达经济体贸易增长的起点比较低。

2013年度报告发布以后，发达经济体的一些风险因素大幅减少，包括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的财政边缘政策纷争。目前，发展中经济体是几个正在聚集的风险焦点，这些风险包括经常账户呈现巨额赤字（印度和土耳其等），货币危机（阿根廷），产能的过度投资，以及再平衡经济体更多地依靠国内消费而减少外部需求。

地缘政治风险是全球贸易预测中一个额外的不确定因素。中东、亚洲及东欧

的内部矛盾和地区冲突有可能引发能源价格走高，冲突升级将扰乱贸易流动。因为这些风险发生的时间和影响程度本质上不可预测，所以WTO的预测中没有直接考虑这些风险因素。

（原文为英文：“Modest Trade Growth Anticipated for 2014 and 2015 Following Two Year Slump”。见[http://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14\\_e/pr721\\_e.htm](http://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14_e/pr721_e.htm)。2014年4月。编译：吴海英。）

## 凛冬将至：IMF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之后未完成的改革

克莱尔·沙克特（Claire Schachter，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国际体系与全球治理项目研究助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2014年春季会议在华盛顿举行。各国高级财政官员对全球经济前景给出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好的预期：全球经济增速回升、美国经济复苏动力强劲、欧洲前景向好。然而如果从更宏观的角度重新考察现状，情况并没有这么乐观。新兴市场增速放缓、中国影子银行风险、南欧内需疲弱均给全球经济稳步复苏带来不确定性。2008年后，各国实施了大量未完成的经济和金融政策改革。国家领导人和国际金融机构有必要重新致力于提升全球经济活力。

全球经济稳定面临六大挑战，这些问题都需要主要经济体来处理。

### 中国内部经济脆弱

2013年，中国提出的推进市场化改革措施令人鼓舞，但这些都无法消除将导致中国增速进一步放缓的结构性缺陷。内需疲弱和信用体系不健全尤其令人担忧。国内外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日趋严格，但如果中国领导人不加强借贷监管，中国经济将有可能垮掉，那些出口大量产品到中国的国家也必然会受到牵连。如何应对未来一年内必将出现的破产，将成为中国政府改革银行体系的重要指示器。

### 美国财政不负责

美国决策者对财政预算争论不休。这阻碍了美国经济复苏，危害到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并削弱美国引导全球经济复苏的能力。现在，美国有机会重振全球投资者的信心。美联储正逐步规范货币政策，决策者也应该借此机会规范财政政策协商机制，使世人相信不会再发生类似的预算危机。

### 新兴市场的结构性缺陷

美国货币政策紧缩使得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脆弱五国（巴西、南非、印度、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环境变得更加艰难。这些国家需要做好准备应对增长前景的恶化。短期来看，提高利率、积累国际储备、达成区域货币互换协

议等调整，在政治上比通过结构性改革提高生产率要容易得多。但长期来看，这些调整不会提高这些经济体的经济活力。新兴市场应该主动而非被动应对美国经济复苏，以保护本国经济和维护全球稳定。

### 欧元区未完成的复苏和改革

虽然欧债危机最糟糕的阶段已经过去，但是南北欧差距不断扩大影响欧元区的共同复苏。2013年，欧盟金融改革也失去了动力。在缺乏强大的银行部门的情况下，欧元区难以实现全面复苏，这意味着银行监管改革势在必行：包括建立运作良好的单一监管机制，在成员国间就单一清算机制与单一清算基金内容达成共识。如果欧盟成员国能够推进超国家的银行监管和治理，那么欧洲政治和经济一体化将很有可能维持下去，并有助于真正的全球经济复苏。

### 非代表性的国际组织不断增加

2010年，IMF成员国治理和份额改革搁置是一次重大倒退。欧洲国家的阻挠和美国国会的不妥协使欧洲国家在IMF中占据过多席位，导致IMF影响力下降。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金融决策迟迟未能实现，而新的全球经济动荡要求国际组织具有更强的能力来引导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如果下一阶段的全球复苏更加艰难，发达经济体只能怪自己，因为主要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巴西等）在停滞的改革中愈发受挫。

### 全球经济失衡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六年后，全球失衡仍然持续。赤字国家和盈余国家的经常账户失衡较2008年有所改善，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全球需求减少，且改善空间有限。2009年，G20推出共同评估程序（Mutual Assessment Process, MAP），以提高G20成员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性，但效果未达预期。G20应该将MAP的关注重点放在成员国的核心金融侧重点上，并改革审议程序，以确保不会因寻求共识而使成员国减少对最具争议的存在不稳定因素的问题的关注。

无论是美欧银行监管机制还是IMF和世行的治理，这些未完成的改革使得新的经济形势严峻，其结果会直接影响全球经济稳定。春天更容易使人感到乐观，但全球经济环境仍然严峻，寒冬无可避免。出席IMF与世界银行春季会议的领导人不能忽视建立完善的多边危机管理和政策协调机制的必要性。

（原文为英文：“Winter Is Coming: Beyond the IMF-World Bank Spring Meetings, an Unfinished Battle for Reform”。见<http://blogs.cfr.org/patrick/2014/04/11/winter-is-coming-beyond-the-imf-world-bank-spring-meetings-an-unfinished-battle-for-reform/>。2014年4月。编译：孔莹晖。）

## 何谓更好的货币体制？

埃德温·M. 特鲁曼[Edwin M. Truman,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IIE) 高级研究员]

欧元区经济与金融的挑战依旧持续，近期部分新兴市场也承受压力，一个熟悉的问题随之浮现：对承受此类压力的国家而言，何为最好的货币体制？答案是，不存在所谓的能够适用于所有国家、各个时刻（包括压力时期在内的全部情形）的最优货币体制。一国的货币体制刚性越大，如加入某一货币区或采取硬性挂钩制度，其寻找正确的宏观政策工具以实现经济与金融的稳定性就越发重要。然而，一整套工具的运用并不能保证政策的成功。

看看欧元区各国。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达到巅峰时，各国其实无需担心其汇率面临的压力。而在1992-1993年因欧洲货币体系的半固定汇率机制引发的危机中，许多国家的货币被迫贬值，尽管其经济有所恢复，但这些国家却遭遇了持续多年的经济混乱。

2008-2009年，欧元相对美元贬值了15%，但这一贬值对整个欧元区生效，并不是德国马克升值、意大利里拉贬值。此外，欧洲央行（ECB）大幅放宽货币条件，以平滑全球金融危机对欧元区整体经济的影响。就实际有效汇率基而言，与国际清算银行（BIS）报告的其他61国出于通胀率变动而进行的货币调整相比，自2007年中期到2009年后期，欧元均在低于5%的窄小范围内波动。可见，欧元区选择的货币政策很好地服务了各国。

然而近期，对其中个别国家而言，参与欧元区的益处有所下降。从2009年后期到2012年后期，当几个欧元区国家身陷危机时，欧元相对美元再次贬值了15%，同一时期的实际有效汇率基也有相近幅度的下降，但欧元的贬值配上欧洲央行仅仅是温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并未能使危机中的欧洲国家恢复增长，也未能弥补其在过去十年内丧失的竞争力。

财政政策和价格/工资弹性不足以补偿汇率或货币政策工具的缺陷。或许一些国家本不该加入欧元区，但过去的就只能过去了。如果它们不这么做，全球金融危机时就无法获得欧元带来的好处。或许2009年后它们本该从欧元区退出，但退出的经济与金融成本对其与同伴来说又是巨大的。

而今，备受瞩目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拥有其各自的货币政策。基本上，它们不允许根据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调整汇率。近期，几个国家——巴西、印度、土耳其、南非等——的汇率遭遇了不受欢迎的下行压力，其央行对更为紧缩的货币政策有所抵触，并出于减缓经济增长的考虑使用外汇储备。

弹性汇率和国家对货币政策的控制已被证实不足以提供最优化的经济结果，原因在于，至少部分上述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经济已经过热，形成了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与高通胀率，且对短期资本流入成瘾，由此造成了货币错配。或许这一现状比已经实行硬性挂钩制度或成为某一货币区的成员要好，但即便能在更大范围内使用汇率和货币政策工具，这些国家也无法逃离压力。

上述两个故事告诉人们，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国家、各种情况的最优货币体制，但无论一国的货币体制如何，在危机来袭前都必须谨慎地使用可行的工具。

(原文为英文：“Are Countries Better Off with Their Own Monetary Regimes?”。见 <http://blogs.piie.com/realtime/?p=4271>。2014年4月。编译：黄杨荔。)

## 加里·贝克尔是对的

梅森·皮里 (Duncan Madsen Pirie, 英国亚当·斯密研究所研究员)

加里·贝克尔 (Gary Becker) 的重要贡献之一是他没有将经济学局限在经济自身，而是运用经济学思维去分析社会活动中的大量行为和关系。本文从犯罪、古巴问题、毒品、移民四个方面概括贝克尔的观察，并说明他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是对的。

### 犯罪

贝克尔以将经济学思维运用到狭隘的经济交易之外的广泛领域而闻名，犯罪就是其中一个领域。之前人们对于犯罪的认识是，犯罪活动由精神失常或社会压抑而来，应对方法可以是提高精神健康水平、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1968年的论文《犯罪和惩罚——一种经济学方法》及后续研究中，贝克尔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他认为罪犯的基本想法是寻租，他们努力获取别人创造的资源，而自己却不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贝克尔认为，罪犯是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人，他们在犯罪带来的收益和可能被抓住而受到的惩罚之间权衡。

社会可以用两种方法改变这种成本—收益等式：加强监查，或提高惩罚力度。增加警力的成本相对更高，而提高处罚力度则更容易做到。

贝克尔的洞见改变了政府应对犯罪的态度。例如，“零容忍”的态度使得潜在的罪犯感觉到自己被抓的可能性更高了；摄像记录使得监查更有效率；另一方面刑罚力度的上升也提高了犯罪的成本。

### 古巴问题

多年来贝克尔都与理查德·波斯纳 (Richard A. Posner) 一起写博客，在他去世之前所写的最后几篇文章中，有一篇题为“是结束对古巴禁运的时候了”。

美国对古巴的禁运始于1960年，其目的是对卡斯特罗的共产主义政府施压并鼓动古巴人民推翻它。但禁运并没有实现这一目标，反而成为了古巴共产主义经济失败的遮羞布。

1959年的古巴，出口烟草和糖，人均收入高于当时出口大米和糖的台湾地区。现如今台湾地区已经成为了一个参与全球贸易的现代、开放的经济体，人均收入比古巴高出五倍以上，而古巴的主要出口品依然是烟草和糖。贝克尔写道：“古巴已经不再能威胁到美国利益，继续用禁运来惩罚古巴人民，或为古巴领导人就糟糕的经济表现提供托词已经没有意义。”

反对禁运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禁运所惩罚的对象是错的。禁运损害了受限国家里穷人的生活水平，他们无法接触到国际商品，也不能在全球市场上销售自己的生产成果。同时，禁运也伤害了施加限令的国家，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估计，对古巴的禁运每年使美国损失近12亿美元，损失主要来自旅游业、农业和其他行业的潜在收入。

贝克尔倡议，除去极端情况，美国应该始终遵循自由贸易，这也得到了大多数自由市场支持者的认可。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认为，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将引领各国走向最终的和平，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更加能够互相协商并和平处理争端。而且，贸易国将各国视为伙伴，互相依赖以获取食物，并使双方民众加深了解。

贝克尔是对的，解除对古巴的禁运将为古巴人民带来丰厚的收益，还可能加速古巴告别共产主义并加入现代世界。

### 毒 品

2013年2月贝克尔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大麻的去犯罪化。十个月之前他曾公开倡导对大范围的毒品实行合法化。他列举了毒品去犯罪化的几个好处，比如削减毒品卡特尔，使得需要医疗帮助的人得到治疗，并节约执行成本。

毫无疑问的是，针对毒品的战争已经演变为一场灾难，毒品生产国和消费国涌现出大量犯罪行为。成百上千万的谋杀案由此而生，非法毒品交易带来的巨额利益腐蚀了许多国家的法制。毒品并没有得到抑制。理性的人们都希望提出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然而，许多立法机关和媒体都坚持认为，对于那些明知无用的措施，我们甚至应该做得更多。

贝克尔的看法与亚当·斯密研究所不谋而合，我们倡导毒瘾应被看作一个医疗问题而非犯罪问题，应设立更多的诊所并配备医护人员，应使毒瘾患者得到医疗检查和治疗建议。因为人们不会通过就医来获取娱乐性的毒品，我们呼吁大麻、摇头丸和可卡因应得到合法化。

这样一来，基于毒品交易的犯罪行为就能够消失。青少年不再会为了毒品发

生枪战，监狱也不再会人满为患。人们将不再发觉自己的习惯与法律相悖，不再视警察和法官为敌。质量监控将使得药物感染和过度服用得到控制。

是的，毒品使用可能上升，更多年轻人可能想尝试，就如他们今天对待烟草和酒精那样。但我们目前面临的状况更为糟糕：毒品使用量接近美国对酒精的定额限制，犯罪团伙发展迅速。是尝试贝克尔方法的时候了。

### 移民

贝克尔对移民问题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建议对在美国或英国生活或工作的权利标价出售。他认为政府应该制定一个价格（比如5万美元），并接纳那些愿意为此付价的外国人。当然，恐怖分子和罪犯应被排除在外，但对于其他人应该敞开大门。

贝克尔的理由是，这样做能够使移民为接纳国带来最高的价值。有能力的人乐于付价，因为与穷人相比，他们从穷国移民到富国更能享受到收益；年轻人更能被吸引，因为可以有更长的时间工作以收回移民的投资；相比那些倾向于回国的人，计划永久居住的人也将有更长的时间享受收益。这三类人都是更令人满意的移民。

不管细节上的问题，显然人们会认可贝克尔对于移民的原则性看法：能为东道国做出贡献的人应该被鼓励移民。有些国家已经制定了相关计划：圣基茨和尼维斯岛为那些在糖产业投资25万美元和在房地产业投资40万美元的人提供公民身份和居住权；多米尼加为投资10万美元的人提供公民身份；美国为投资50万美元并为美国人创造了10个就业岗位的人提供绿卡，加拿大接纳付价40万加元的移民。

贝克尔的提议确实会面临关于移民涌入带来的福利和健康方面的质疑。然而，当移民大多为年轻人并努力寻求工作时，这样的质疑就有所减弱。即使是那些反对移民的人，也会欢迎熟练工和为本国投资的人。

（原文为英文：“Gary Becker Was Right”。见<http://www.adamsmith.org/blog/economics/gary-becker-was-right-part-six-the-family>。2014年5月。编译：李想。）

## 阻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真正原因

丹尼尔·R.皮尔逊（Daniel R. Pearson，美国加图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过去几周，日本和美国进行了一系列高端磋商，试图达成双边协定，以完成涵盖12个成员国的TPP协议。日本经济财政政策大臣甘利明分别在东京和华盛顿会见了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洛曼（Michael Froman），希望在奥巴马访日之前解决各种分歧。有关报告指出，日美双边高端会谈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两国之间

仍存在较大分歧，这可能阻碍4月24日两国元首会晤时突破性进展的达成。

上述阻碍美日双边高端会谈的因素主要在于，日本不愿意废除敏感性农产品（即牛肉、奶制品、猪肉、大米、糖、小麦）的进口关税，而美国不愿意削减对汽车进口产品征收的2.5%的关税，以及对轻型卡车进口产品征收的25%的高关税。日美两国有充分理由要求对方改变这些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它们阻碍着竞争优势的发挥，抬高了消费者成本，使有效率的生产者丧失出口产品的机会，从而降低总体经济的福利水平。废除这些贸易抑制措施不仅能使当事国要求对方改变时更有底气，也能促进当事国的经济发生改变。

回顾议案细节，美日两国面临的真实问题是隐藏在贸易政策表象下的政治诉求。日本农民强烈反对减少其通过关税保护而获得的补贴，这一状态已持续了几十年，而且这些农民是安倍自由民主党一贯的、忠诚的拥护者。如果日本农业政党对安倍政权的不满意达到一定程度，那么，安倍政府铁定会倒台。但是，安倍首相貌似愿意推进农业改革政策，因为他深知改变日本现行农业政策是加入TPP协议的关键条件。

美国的政治考虑则与日本有所不同。从理论上讲，美国应该废除对进口日本汽车相关产品的关税保护。但事实上，一方面，美国对进口汽车产品征收的2.5%的关税并不高；另一方面，对轻型卡车征收的25%关税的保护效应已明显被日本企业在美国进行的生产设备投资所抵消，一大部分“日本”汽车是在美国组装完成的。然而，美国汽车产业及其工人并不希望削减关税，奥巴马政权无疑也持这一观点。

美国方面，美日谈判陷入僵局真实原因在于，缺乏将TPP协议提交到国会，以寻求直接表决的快速通道（也就是贸易促进权）。如果没有快速解决通道，任何关于TPP协议的争议部分即便被提交给国会，也很难解决。坦白地说，尽管快速解决通道已经存在，但是，现有国会要通过TPP协议也需要很长时间。

此外，奥巴马民主党派中仍然存在广泛而顽固的势力反对“快速审批贸易条约权”。这股反对势力不仅包括有组织的劳动者和左派公民社会组织，还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雷德（Harry Reid）、众议院少数党派领袖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以及国会中其他党派的同事。尽管奥巴马政权支持“快速审批贸易条约权”这一概念，但至今没有出台任何具体立法提案。

奥巴马政府并未暗示其在克服“快速审批贸易条约权”所受民主抵抗的进展，眼下，国会成员的争议正好与奥巴马的亚洲之旅不谋而合，这意味着奥巴马政权将失去执政根基。在奥巴马执政的第一个5年期间，白宫并未有效地解决此类来自其政治根基核心政党的强烈争议，因此尚无先例可借鉴。他们似乎不太可能找到解决快速审批贸易条约权矛盾的途径，尤其是这可能会被视为倾向于共和



党而非民主党。这一推动贸易自由化的重要突破可能会被搁置，至少在2017年新政权上台之前不会有大的进展。

日本政府密切关注着美国的贸易政治。安倍首相注意到，美国在将TPP推向完全贸易自由化方面并不处于绝对强势地位。但奥巴马总统即将访日，日本政府有必要在此方面有所表示。在美国实施“快速审批贸易条约权”之前，日本应该提前废除农业关税吗？当美国谈判者似乎只具有有限的可靠性和影响力，或者近期证据表明，美国的双边TPP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真的想就此达成协议吗？如果日本冒险尝试，同意削减关税，要是2014年11月份美国中期选举后，美国却不能做出任何努力，那又将怎样？安倍政府是否会因此陷入困境？

最终结果是，安倍首相似乎会远离其当初对日本农业真正实施的全面改革政策。在看清美国方面没有任何进展的情况下，安倍无法将任何条款拿到桌面上。

不幸的是，美国总统这次访问日本正逢美国谈判影响力相对较弱的时期。达成协议的压力似乎使美国谈判当局同意日本继续维持明显的农业关税保护政策。未来几年内TPP谈判可能无法达成，甚至永远都不能达成。最重要的谈判基础已经丧失了，再次通过贸易谈判实现更大程度贸易自由化的努力注定将失败。并且，参与TPP谈判的另外11个国家是否愿意、是否能够等待若干年以期望美国最终与它们达成一致意见，它们的态度也是不明确的。接下来需要考虑的，也许应该是如何维持能在未来某个时点达成泛太平洋贸易自由协定的信心。

（原文为英文：“What’s Really Impeding Progress in the TPP?”。见<http://www.cato.org/blog/whats-really-impeding-progress-tppwhats-really-impeding-progress-tpp-japan-united-states-have>。2014年4月。编译：刘兴坤。）

## 对俄罗斯的制裁：事实及评价

加利·克莱德·霍夫鲍尔（Gary Clyde Hufbauer，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雷金纳德·琼斯资深研究员）

凯思琳·奇米诺（Cathleen Cimino，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泰勒·莫伦（Tyler Moran，美国全国移民法律中心政策主任）

随着俄罗斯持续威胁乌克兰，西方国家陷入了一场对于可能发生的制裁顺序、实质和影响的极具历史意义的讨论之中，以期改变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利益权衡。过去制裁的历史为决策者制定接下来的规划提供了一些参考。

### 回顾制裁

迄今为止，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比较微弱。美国和欧盟都曾对前乌克兰政府

和俄罗斯政府的个人进行过制裁，影响波及70余人，其中包括普京的几名亲信。

2014年4月，美国扩大了制裁力度，制裁对象覆盖了特定个人所持有或控制的19个公司或实体，但欧盟并没有同时进行制裁。这些指定的公司大都集中于金融、能源和建筑行业。美国商务部还对其中的13家公司施加了额外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

### 美国—欧盟与俄罗斯贸易往来

欧盟与俄罗斯广泛深入的贸易与投资往来，是欧盟抵制严格制裁俄罗斯的主要原因。2013年，欧盟对俄罗斯出口总额达到了1590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只有110亿美元。2012年，欧盟在俄罗斯的对外直接投资(FDI)为2430亿美元，美国只有140亿美元。然而，俄罗斯对大西洋两岸的投资相比之下十分微小。俄罗斯是欧盟的第四大出口目的地，同时也是继中国之后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国。欧盟从俄罗斯的进口额(2740亿美元)是美国从俄罗斯的进口额(270亿美元)的10倍以上。对于欧洲来说，能源占据了从俄罗斯进口总额的75%。而且，俄罗斯目前是欧盟的第三大石油和天然气供给国，这使得欧盟对俄罗斯有较强的能源依赖，在天然气上尤甚。

### 对俄经济制裁的可能影响

最近的制裁，以及一些可能发生的附加惩罚措施，大大降低了投资者对俄罗斯前景的信心程度。2014年第一季度，俄罗斯的净资本流出大约为640亿美元，这一数量比2013年全年资本流出总额还要高。俄罗斯的部分家庭以及企业开始抛售手中的资产或者货币，从而持有欧元以及美元。这样的行为进一步造成了卢布的大幅贬值。

基于这些现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持续下调俄罗斯2014年的增长预期。此前，这一预期值大约是3%，2014年4月份初，IMF将其下调至1.3%的水平，并在4月底又再次下调0.2%。鉴于美国和欧洲目前的惩罚力度还不是特别强，并且也局限于某些行业，制裁带来的负面影响尚未真正体现。

### 历史的经验

在《反思经济制裁》(*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这本书中，作者发现，1914—2000年发生的204次经济制裁中，只有大约1/3的制裁真正得以实现。而对于乌克兰这种中等或者更大国家的制裁，制裁成功的可能性更低。但是从历史上发生的制裁中，我们可以吸取很多教训。

——不要过度追求更高的惩罚目标。政策制定者应当避免对于制裁的过度期望。制裁通常不会削弱对方的军事力量，因此目标适度才可能带来成功。在乌克兰事件中，应当对即将发生的东乌克兰侵略行为进行阻挠，而不应试图逆转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既定事实。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经济联系的密切性是制裁有可能获得成功的一大优势。经济制裁通常是非常有效的。

——不要过度指望俄罗斯民众意见的影响。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民主政治制度更会受到经济压力影响。

——经济制裁可以通过大规模冲击的方式展开。逐步施加制裁的行为可能会导致对方政府处理危机能力的提高。

——通常，制裁联盟并不会使制裁成功的可能性提高。国际合作并不是影响成功的基本因素，但对于俄罗斯，一定程度的国际联盟可能会带来有利的影响。

——选择正确的方式进行制裁。经济制裁配合军事合作或者秘密行动，可以使制裁成功的可能性提高。

——施加制裁的政府必须考虑到制裁收益和成本的平衡。就目前来看，美国，特别是欧洲各国面临着国内企业对于能源和金融制裁的大规模抗议。

——施加制裁的政府应当充分考虑可能的成本和结果。

（原文为英文：“Ukraine-Related Sanctions: Facts and Assessment”。见 <http://blogs.piie.com/realtime/?p=4309Gary>。2014年5月。编译：苏丹。）

## 印度新政府的外交政策议程

### 印度国防研究和分析研究院

外交政策是以国家的长期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它需要同时考虑到国内和国际因素。当政府发生变动的时候，一个国家的战略利益不会发生变化，但是国家的处事风格 and 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确实会发生变化。这样，我们就预期会在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当中同时发现变化的和不变的内容。

#### 成就和不足

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印度的外交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就。印度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接触有了显著的增长，它同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也比以前更好了。甚至就同邻国的关系而言，双边关系也得到了显著增强，尽管依然有一些问题存在。就广义上的邻国而言，印度的“向东看”（Look East）政策已经取得了成功。印度目前正在关注新的地区，如非洲和拉美地区。印度洋也是印度外交政策制定者们新的关注焦点，海洋和能源安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公共外交也得到了显著发展。印度在全球和地区层次上同很多国家都在发展关系，而这些国家也希望同印度建立更深层次的友好关系，并且发展更加紧密的合作。事实上，本地区的国家越来越多地要求印度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印度并没有被看作是一个威胁，而是自己不愿意并且仍然没有准备好承担它的大国角色。

不过，仍然有很多不足之处值得关注。实施积极外交政策的资源还是有限

的。在关键的外交政策上缺少政治共识一直是印度外交的一个障碍。相对于正在出现的机会而言，外交政策制定过程总是显得非常缓慢。正在不断变得越来越突出的领域，如能源、网络、太空和经济等领域当中，印度的外交还明显缺乏力度。标新立异在很多外交政策领域当中都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在诸如军事外交这种没有长期战略可以利用的领域当中。就外交政策的执行而言，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不足。

印度政府并不善于通过官方的白皮书和文件来解释它的外交政策，其结果就是缺乏指导印度外交政策的清晰的原则和目标。外交政策没有同任何国家安全战略联系在一起，而政府至今也不能澄清这些战略是什么。

### 新政府的日程

新政府可能会继续推动外交政策当中业已存在的积极方面，在不同领域予以完善和加强，并可能会在同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方面寻找一些突破点。

以下的这些建议——从本质上来讲是最一般的——是国防研究和分析研究院的专家们在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之后提出来的。这里面可能会包括新政府的外交政策日程。

——澄清印度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理念。这就意味着要概括出印度外交政策的原则和目标。

——为外交提供更多的人力和财力支持。当前对于外交的拨款严重不足，不足以制定和执行有效的外交政策。

——注意发展伙伴关系，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发展伙伴关系应当成为印度外交政策的核心工具。

——时刻关注寻找新的机会。这就意味着要加强印度同其他国家的接触，并且增强它在战略地区的存在。这应当是遵循战略手段和商业手段的结合，而不仅限于商业手段。只要有可能，私人部门就应该被包括在外交政策行动中。

——在外交政策问题上达成政治和国内共识，同时确保中央政策能够制定和执行涉及到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

——将改善同邻国的关系作为第一优先目标。高层次的政治往来和访问可能会变得更加频繁，在安全问题上则可能会采取地区合作政策。

——印度应当在同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方面寻求突破，但是应当注意手段。友好和合作的姿态应当得到恰当的回音，但是巴基斯坦也很清楚印度在恐怖主义问题上的红线。中国不应该被允许轻视印度，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力量不对称可能会有所减小。印度应当发展综合国家实力来应对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

——深化同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关系。能源合作、贸易和投资以及在海湾国家工作的印度公民的福利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应当扩展这些关系来覆盖诸如

食品安全这样的新领域，吸引海湾国家对印度农业和粮食部门的投资。

——由于中国在东盟地区表现得越来越咄咄逼人，印度可会深化与东盟国家的关系。这可以通过更深入的经济一体化，以及增强连带性和防卫合作来实现。

——增强同致力于寻找新伙伴的日本的关系，特别是在安全合作领域当中，这并不针对任何国家。

——特别关注外交政策当中的海洋合作问题。在亚太地区，美国、中国、日本、韩国和俄罗斯是关键国家，而印度同它们都有独立的关系。印度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应该独立于美国的再平衡政策。

——向印美关系注入新鲜的因素，应该关注经济、技术和防卫合作问题。

——继续同俄罗斯深化关系。俄美关系由于乌克兰问题而变得紧张起来，对于增加对俄罗斯制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印度应当避免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印度应该避免卷入俄美紧张关系之中。

——非传统安全问题应该得到特别关注，特别是能源、海洋、食品、太空和网络安全问题。印度外交应当依靠专家在这方面做得更深入。

——国防和外交必须齐头并进，外交当中的国防部分需要增强。

——使用经济外交来推动印度的经济增长。经济外交应当成为印度外交的核心组成部分。全球化和技术所推动的新经济秩序要求重新理解外交。印度应当谨慎观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执行情况，然后再决定是否加入谈判。印度到目前为止都是谨慎的。

——印度不需要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但是同时也要加强其指挥和控制系统。

——印度外交应发挥巨大的印度移民群体和在国外工作的印度公民的作用。

——印度须通过鼓励智库的增长来实质性地增加在战略思想领域的投入。

——印度必须利用其文化和软实力来支持外交政策目标。

## 结 论

印度拥有史无前例的机遇通过利用外交政策来实现发展抱负和满足安全需求，而这二者则是互补的。对于印度而言，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实行积极的外交政策的必要条件。印度的外交政策必须有国内共识以及包括战略思想库在内的能力的支持。更多的资源和更加积极的思维模式是实现这个目标所必需的。要更有效地执行这种外交政策，更好的政府部门间和机构间的协调是必要的。外交政策制定应当成为整个政府的任务，在其中非政府机构和各邦也将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原文为英文：“Foreign Policy Agenda for the New Government”。见 [http://www.idsa.in/policybrief/Foreignpolicyagendaforthenewgovernment\\_agupat\\_27051](http://www.idsa.in/policybrief/Foreignpolicyagendaforthenewgovernment_agupat_27051)。2014年5月。编译：赵洋。）

